

# 小小蝗虫，见证唐朝兴衰

## 姚崇治虫

### 微虫相伴 兴亡过眼

据统计，有唐一代两百八十九年，大约每七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蝗灾。面对蝗灾，不同皇帝的态度不尽相同，所反映出的治国理念更有着不小的差别。

唐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，“京畿旱，蝗食稼”（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），甚至皇宫内苑也受到了蝗害侵袭。太宗前往视察，随手便抓起几只。他先是咒骂蝗虫毁坏庄稼就是伤害百姓，然后又郑重发愿：“你们如果真能通灵，就吃我一个人，不要伤害我的百姓！”说着不顾诸臣劝阻，把蝗虫一股脑放在嘴里吞下去。

说来也怪，这年蝗灾随后就稀里糊涂地消失了。然而蝗灾并没有偃旗息鼓，从太宗到高宗，经过武则天直到玄宗朝，大规模蝗灾仍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发生。王朝君臣也不敢寄望于蝗虫真的能“通灵”，只能调动国家力量，全力扑灭蝗害。其中最著名的，莫过于玄宗初年名臣姚崇的灭蝗事迹。

姚崇原名姚元崇，陕州硤石人。开元四年，一场规模远超贞观初年的特大蝗灾肆虐大唐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。民众惊骇之余，认为这是天降灾祸，不仅不敢捕杀，反而为蝗神设祭跪拜。见此情景，姚崇上奏，强烈要求全力灭蝗。不仅有主张，姚崇还查阅典籍，给出了具体办法：夜间燃起篝火，在旁边挖掘大坑，蝗虫趋光而投火，可一边焚烧一边就地掩埋。唐玄宗当机立断，派出捕蝗使分赴各地，督导灭蝗。

但是灭蝗并不容易。除了民众的愚昧，主要障碍来自朝廷内部的思想纷争。从中央到地方，官员纷纷上书反对灭蝗，认为天灾非人力可制，“除天灾当以德”。这其中，以汴州刺史倪若水和黄门监卢怀慎为代表。面对重重阻力，姚崇痛斥反对者是“庸儒泥文不知变”，历数历朝治蝗成败教训，质问反对者“若（对蝗灾）纵之，谷且尽，如百姓何？”在姚崇的坚持下，灭蝗政策终于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，仅倪若水治理的汴州一地就捕杀蝗虫十四万担，“蝗害讫息”。

蝗灾的剿除为唐玄宗的施政奠定了基础。此役之后，唐玄宗任用姚崇、宋璟、张说、张九龄等名臣宰相，整顿吏治、兴修水利、发展生产，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开元盛世”。

自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天人感应之说便逐渐深入人心。唐代自然也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，认为灾害的发生，乃是因为王道不行因而上天降下惩罚，即狄

黄云密布，遮天蔽日，所过之处，颗粒无收。这就是蝗灾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。那么，蝗灾在中国历史上又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呢？

小小蝗虫，在人类历史一次次大规模出现，给各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。而在中国，蝗灾在各朝史册上也比比皆是，影响并见证着一个个王朝的兴亡更替。这其中最典型的例证，莫过于唐朝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齐白石《竹笋蝗虫》

仁杰所说“政不行而邪气作，邪气作，则虫螟生而水旱起。”（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）人们也会将灾害、灾异与帝王失德联系起来。如果执迷不悟，帝王也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。因此发生灾难，皇帝往往以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”的名义下诏罪己。

## 晚唐蝗灾

### 弥天大谎 盛世覆灭

繁华谢幕、国事日非，而唐王朝与蝗灾纠缠的历史却并没有结束。一百多年后的唐僖宗乾符二年（公元875年），大唐帝国已是江河日下。中央宦官专权，党争不断，地方藩镇割据，各霸一方，唐僖宗则成天热衷游猎，不理政事，以王仙芝、黄巢为首的起义民众也渐成燎原之势。这年七月，一场蝗灾又一次降临在大唐的土地上。漫天飞舞的蝗群自东向西席卷而来，目标直指京城。史载：“（蝗灾）蔽日，所过赤地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六八》）。

当此危急关头，负责京畿治理重则的京兆尹杨知至却奏报称：“蝗虫飞入京畿，不吃庄稼，全部抱着荆棘饿死了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六八》）如此弥天大谎，杨大人撒得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天子盛德，感天动地！以宰相为首的群臣也是竞相朝贺。唐僖宗被吹捧得晕晕乎乎，自然不愿意去鉴别真伪，转过身就去从事他最热衷的马球运动了。

自此灾荒四起，流民遍地。“群盗侵淫，剽掠十余州，至于淮南”，起义领袖黄巢几经转战，入河南，破潼关，最终把唐僖宗赶出了都城长安，建立了大齐政权，也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。

安史之乱后，河北河南，乃至两淮等重地皆已成为藩镇割据的国中之国，赋税自输、军队自领、威福自行，在藩镇的骄兵悍将眼中，朝廷权威早已荡然无存；而中央政局也是一片糜烂，自宪宗开始，以李德裕、牛僧孺为代表的两派朝臣就开始相互攻讦，党争内耗。而皇帝为了巩固权力，在朝臣之外又崇信宦官，甚至将中央禁军的统辖权交给宦官，结果宦官权柄日重，逐渐将皇帝和朝臣玩弄于股掌。唐穆宗以后，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是由统领神策军的宦官拥立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甚至都被宦官杀害，以皇帝为代表的唐王朝统治合法性自此沦入谷底。

懿宗统治末年，驻守桂林的戍兵因不满镇将刻薄、归日无期，推举军官庞勋为首领愤然举兵，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兵火荼毒的江淮大地此时旱灾大起，蝗灾相继（《旧唐书·懿宗本纪》），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唐僖宗即位后，在权宦田令孜把持下彻底成为傀儡，在歌舞升平、纸醉金迷中迎来了“不吃庄稼，饥饿而死”的蝗虫，迎来了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黄巢大军，也迎来了唐王朝近三百年统治的末日。

一只小小的蝗虫，就这样成为煌煌大唐的伴随者和见证者，浓缩了一代盛世从奋起、承平再到沉沦的命运。

## 鲁迅为李大钊文集作序

1927年12月21日，鲁迅应章衣萍之邀到暨南大学演讲。演讲的题目为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”。记录稿有两份，一份是校方安排章铁民记录的，一份是在该校任教的曹聚仁因慕名到场自行做的记录。鲁迅对曹聚仁的记录更为满意。1933年曹聚仁正在编上海滩很有名气的《涛声》，就常向鲁迅约稿，一来二去，相互就走近了。

这年5月7日，曹聚仁致信鲁迅，请他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。鲁迅即回信：“惠函收到。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，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，不过于学说之类，我不了然，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。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，或者不至于迟罢。”鲁迅信守诺言，就在该月底写好了，寄给曹聚仁。曹聚仁即将这篇深情怀念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朋友的文章《〈守常文集〉题记》编发在自己主编的《涛声》上。

为编辑《守常文集》，曹聚仁付出了很多心血。而最早向他提议出版《守常文集》的，却是周作人。曹聚仁

本身就是群众图书公司老板，便答应了周作人。就该书的出版事务，二人经多次通信，如请哪些人题字作序等讨论多次。周作人对该书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：文集能出版最好，如不能出全集，选集也行，但不能删节，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入为好。鲁迅也想到书稿送审会遭到删节等麻烦，他的意见是：“我以为不如不审，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，卖一通就算。”

曹聚仁很乐观，认为李大钊死在国民党“清党”之前，那时还在国民党任要职，给他留个纪念，应该不是问题。结果证明，曹聚仁想得天真了，尽管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都做了最大努力，《守常文集》最终还是胎死腹中。可喜的是，鲁迅写的《〈守常文集〉题记》先刊《涛声》，后又编入鲁迅的《南腔北调》。鲁迅所写的李大钊的“遗文却永驻，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、革命史上的丰碑”，却回响在墨一般的漫漫长夜。

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## 沈从文著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

1951年，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。有人为他惋惜，他却说：“从个人来说，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，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；但对国家来说，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损失，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，还从来没有做过。”

从此，沈从文钻进故纸堆，乐此不疲，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，忘我地工作，用10多年时间，苦心孤诣地做出了博大的学问。他对文物、美术、历史服饰的研究，在社会上有极高声誉，搞绘画、戏剧、电影、文物的人都纷纷登门求教、咨询，到处请他去讲课。于是，他萌生了写一部中国古代服饰历史书的想法。

有一次，周恩来陪外宾看戏，发现演员穿的服饰很乱，就问有关官员：谁在研究中国服饰？该官员了解后说，沈从文在做。周恩来说，能不能编一本书，详细整理一下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，沈从文名正言顺地做起了这项

工作。

正当沈从文与助手范庚、张大刚、李之檀夜以继日，创造性地工作时，康生见到一些完成的章节，大感兴趣，愿意为书作序。谁知“文革”爆发，于是工作被迫停止。后来出版社要把书稿当成废品卖掉，沈从文得知后，与研究人员急忙把书稿拉回历史博物馆，封存了10年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，继续完成了这部著作。

1981年，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部凝结着沈从文先生下半生心血的巨著，资料丰富，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，时间上历经万年，涉及的研究对象也远远超出了服饰范围，堪称一部浓缩的古代文化史。甫一问世，举世轰动，成为我国文物史的瑰宝，是一部具有极高的文化和美学价值的煌煌巨著。孙机先生称此书为“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”。

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